



中國人民大學 学报

工作论文系列

Working Paper Series

从对象的“历史”到方法的“历史”：
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实践思考

王续添

JRUCWP2024024

2024. 04. 08

- * 本刊编辑部将那些已通过审稿程序而处于“拟录用”状态的稿件制作成线上展示的工作论文，旨在及时传播学术研究成果而促进学术进步。
编辑部还将继续与作者共同努力，修改完善论文，并在其达到刊发标准之后择期正式刊发。当然，若工作论文被发现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则仍有可能被退稿。

从对象的“历史”到方法的“历史”： 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实践思考

王续添

[摘要]“历史转向”作为当下社会科学的一种发展取向，实际是社会科学研究重新走入历史，既有现实需要又面临实践挑战。从以“历史”为对象到以“历史”为方法是必由之路。以历史为对象即所谓“对象”的“历史”，具有“借助”和“研究”两重内涵，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转向实践显现了不同程度、不同层次和不同成果品相的意义。以历史为方法即所谓“方法”的“历史”，具有操作方法和思维方法的两重内涵，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转向实践则显现了操作技术和思考技术统一的方法论意义。“历史”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第一层次的方法，是人类自我思考和认识的一种基本形式和主要路径。作为对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历史性存在的系统性认识，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必须历史地思考、历史地理解和解释。以历史为方法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和理论的结合，建构科学性和历史性相统一的社会科学。

[关键词] 社会科学；对象；方法；历史转向；历史政治学

近年来，以历史政治学的兴起为主要标志，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所谓“历史转向”成为各个学科一个具有共同性的研究新取向抑或学术新思潮，引发了持续性的热烈讨论，并推动着各个学科的学术发展。但是，这种研究转向在学术实践上如何具体展开和实际推进，不仅是对此心向往之的学人面临的研究困惑和迫切的学术需求，而且成为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必须处理和解决好的一个共同的学术实践问题。本文拟以历史政治学为例，以整个社会科学为基本观照，从学术实践上分析和阐释社会科学研究从以“历史”为对象到以“历史”为方法的缘由、路径及意义，换言之，试图探讨和说明从对象的“历史”到方法的“历史”，实现历史和理论结合、时间和结构互嵌，建构科学性和历史性相统一的历史社会科学何以成为其研究转向的必由之路。

一、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现实需要和实践挑战

在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转向”已成为对各个学科学术研究取向或趋势表达的一种“习语”。在不同的学科或者同一学科的不同研究领域，有各种各样的“转向”，诸如文学转向、历史学转向、哲学转向、语言学转向等等，既彰显了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对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基础性，又体现了社会科学各学科对人文学科的依赖性。现代社会科学的“历史转向”，并不是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再次回归历史学，而是指社会科学研究重新走入历史，走进历史的深处，从历史和历史学中

作者：王续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wxtian2368@sina.com。

获取知识养料和元素，获取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方法和技术，形成与历史学相融合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及相应的学术作品，如历史社会学、历史经济学、历史政治学、历史法学等。进而言之，通过借助历史学，通过研究历史，通过运用历史思维和方法，达成理论与历史的深度结合，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的自主性、原创性和新发展，从而，服务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学术实践，也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

（一）“历史转向”的时代驱动和现实需要

放眼世界学术界，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转向”，既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只有一次，而是百余年来社会学与历史学充满着张力、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的一种阶段性的体现，总体上可以说，都是历史和时代的变化在社会科学中的反映。20世纪上半叶，历史社会学在欧美的兴起正是人类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凤凰的涅槃”^①和“从灰烬中复出”^②。同样，近年来，历史政治学在中国的兴起以及由此标志着社会科学的“历史转向”，既不是某些人心血来潮的一时兴起，也不是拿来模仿的“依样画葫芦”，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与时代变革大势为背景和社会科学适应这一大势的一种学术新发展。

从全球来看，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们自然有了“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题”。而在如此之世界中的中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呈现出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局面。如何把握战略大势，如何因应风险挑战，如何推进民族复兴，就成为当下的“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题”。在这样的历史大变革和时代大背景的驱动之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以世界为观照、以中国为观照，而且还要以时代为观照、以历史为观照，将现时代的世界和中国置于世界大历史和中国大历史之中，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看清这种巨变和剧变，才能真正回答“世界之问”“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题”，才能真正服务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服务于“两个结合”创造中华现代文明的现实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③因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④。一句话，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走入历史，是历史和时代赋予的新职任，是时代驱动和现实需要使然。

（二）“历史转向”的学术路径和实践挑战

在当下，“历史转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一股新的学术思潮，对各个学科的学人特别是中青年学人颇具魅力和吸引力。但是，在学术实践上，这种“转向”不仅对于一个个体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实现的，而且对于一个学科群体或学术共同体而言也是如此。因为真正实现“历史转向”即走入历史，一定是以具体研究的展开为基本进路和主要标志的。这里的所谓具体展开，就是走向研究具体化问题化的学术实践，是具体领域、具体问题大规模和普遍化的研究实践及其成果的产出，进一步来说，“具体”的意义是指研究内容的特定性和确定性，而不是一般性和纯粹理论性的“无历史”的研究。仅就历史政治学而言，提出、阐释和建构历史政治学的一般理论是一回事，真正开展属于这一范式的具体研究是另一回事。没有具体的研究，历史政治学就无法实现实质性的展开，如何具体展开成为一个必须解决好的研究实践问题。

从近年来的学术实践来看，政治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即历史政治学在学术实践中除一般建构

^{①②} 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1、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③④}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5、8页，人民出版社，2023。

性的纯理论研究外,具体展开的研究路径主要有思想史路径、制度史路径等。思想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首要的路径也是捷径,制度史则次之。尤其是思想史在“历史转向”的大潮中顺势而为、借势而上,直接而快速地产出历史政治学具体研究的作品,体现为在原来的基础上向前再走一步,从思想史的具体研究中探究一般理论。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原来的思想史研究和历史政治学的思想史路径是不能简单等同的。以思想家个体思想为对象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是非通史型的“小思想史”研究,也不一定追求一般性和理论化。即使致力于上升为一般理论,根本上也还是源自对人的思想即主观世界的推演或归纳,而非源自对历史客观世界的总结和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还是基于原来的思想史研究和制度史研究的所谓思想史路径和制度史路径,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追求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政治学乃至历史社会科学(以下一般仅使用“历史社会科学”的概念)。真正的“历史转向”即走进历史所形成的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径,首先是以整体系统的大历史观指导为前提,将具体研究对象置于产生它们的历史场域加以审视和考察,才能够从整体和宏观上把握它们,才能使历史和理论结合并从历史研究中创新和发展理论。换言之,只有以大历史观为指导,才能实现历史研究基础上的一般性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大历史观为指导的思想史路径和制度史路径,才真正属于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径。以历史变迁和历史过程为对象的政治史路径乃至综合史路径,也更能凸显历史政治学研究路径的意义。尤其是长时段和综合性的历史过程,展现的是客观历史的复杂变化和不断累积的“大历史”,对此展开的政治史路径或综合史路径的研究,才有可能阐发更具客观性和真理性的一般性理论。当然,这后两种研究路径在当下的学术实践上还是少之又少的。而这也恰恰说明了社会科学研究真正走入历史还刚刚开始,面临着主观和客观、内部和外部的多重挑战。

在学术实践上,首先遭遇的就是历史学科的挑战。历史学作为最古老的包罗万象的学科,即使到了现当代,它也是与其他学科联系最紧密,甚至“被戏称为‘跨学科合并最繁忙的地方之一’”^①。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最悠久、又最重视历史研究的国度,历史学有着极为醇熟深厚的学术传统、规范方法和庞大的研究群体。社会科学研究走进“历史”,历史学既是丰厚的学术资源,也是巨大的学术挑战。在中国搞历史社会科学研究,没有历史学基础的社会科学学者往往会对“历史”望而却步。而且,如果得不到历史学界的认可和支持,那么这种研究范式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或者说至少不会那么顺利,学术成果也难以产生应有的学术影响力,因为本质上还是跨学科研究的挑战。跨学科研究旨在摆脱单科治学及其知识生产的局限性,更好地创造和产出新知识,是两个学科及以上的知识和方法的融合。但跨学科使学科间性问题凸显,对于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学术挑战。

其次是“历史”内涵的挑战,即社会科学研究者对“历史”理解和实际处理的多重困境。毫无疑问,研究者对历史社会科学中“历史”含义全面准确的把握,是展开具体研究的前提和关键或曰一把钥匙,直接关乎社会科学研究走入历史能否真正实现,也攸关历史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能否真正建立。当代美国政治学者皮尔逊曾总结指出:“人们可以辨识出社会科学三个显著的‘历史转向’(historical turns)。它们都曾经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库,但各自也有严重的局限性。”这三个“历史转向”,一是“历史即研究往事”,二是“历史即搜寻例证性材料”,三是“历史即产生更多案例的场所”。^②实际上,皮尔逊所指出的三种“历史转向”,至多是对“历史”内涵理解和实际处理的两重含义:“历史”和“历史学”。“历史”即过去,即往事;作为历史学的“历史”,就是对过去和对往事的研究。这两种含义的“历史”都是历史社会科学研究中“材料”和“案例”来源之所在。但是,这里“历史”的第三重含义也是根本含义,是一种与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科学思维和科学方

① 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交叉》,6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② 皮尔逊:《时间中的政治:历史、制度与社会分析》,5-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法相区隔的思考和认识的方法和技术，即历史思维和历史方法。以这种思维和方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正在发生的“现实”也就具有了“历史”的含义。恰恰相反，这三种“历史转向”，显然还是社会科学既有理论对“历史”的需要和框定，仅仅把“历史”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借助的工具，而不是深入历史之中，更不是运用历史思维及方法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历史和理论、时间和结构的关系问题。皮尔逊就此指出：“转向历史基本上不能等同于运用叙事或编纂历史证据，而是构成了事情如何在社会世界中发生的理论主张的基础。”^①只有对“历史”内涵全面深刻的理解，尤其是对思维和方法的“历史”含义的透析，才能走出对“历史”实际处理的多重困境，真正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转向”。

再次是“转向”主体的自我挑战，即研究者大多“历史”先天不足或缺失。现代社会科学早期的研究者和知识生产者，大都来自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各个人文学科。在中国，即使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内，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来自历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学者也还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伴随着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不断发展，单科治学使各个学科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各学科研究者的学科自主性和专门化程度也不断提高。尤其是21世纪以来，经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自身培养和成长起来的大多数中青年学者，从学术背景上来说，历史知识、历史思维和历史方法的先天不足甚至缺失，历史感欠缺和弱化，远离历史甚至“忘记历史”成为不争的事实。^②在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历史都既是因素，也是要素，既是对象，也是方法。如果研究者本身欠缺应有的历史感、历史知识、历史思维及方法，如何从事历史社会科学研究呢？这显然是“转向”主体的自身挑战。因此，“历史”补课、历史思维和方法的补课就成为必须。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历史转向”或者说走入历史，应像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崇尚和追逐一样，补充历史养料，厚实历史基础，吸收历史知识，汲取历史思维，掌握历史方法，培养历史感，从中国大历史和世界大历史的研究与比较中，发现“中国道理”，“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③。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实现社会科学研究走进历史、与历史学的跨学科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以历史为对象到以历史为方法的学术实践过程。

二、对象“历史”的两重内涵及其对“历史转向”的意义

所谓对象“历史”的两重内涵，是指社会科学学术实践中以“历史”为借助对象和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两种情况，是社会科学研究走入历史的两种不同程度和不同层次的学术实践状态。明了这两重内涵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转向的意义何在，是具体展开和实际推进历史社会科学学术实践的基本前提。

（一）“历史”作为借助对象的含义

“历史”作为借助对象，是指社会科学研究中历史学作品的征引和使用。具体包括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对一般性历史知识（历史常识）借助和使用；二是对历史研究作品中引用的资料即被历史研究者选择过的史料的借助和转引；三是对历史研究中得出的历史认识和结论的借助和使用。对于欠缺甚至是没有历史学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进入历史社会科学研究，借助“历史”是首要环节和最初阶段，当然也是历史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基本类型。因为要进行历史社会科

^① 保罗·皮尔逊：《时间中的政治：历史、制度与社会分析》，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② “忘记历史”是当代英国经济学家霍奇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科学“遗忘历史特性问题”的概括。他说：“战后的经济学遗弃了历史特性问题……战后社会学也将自己致力于宏大的一般性主题的研究。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历史特性问题几乎被完全遗忘了。”见杰弗里·M. 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3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③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10页，人民出版社，2023。

学研究，首先就要面向历史。历史在哪里，研究者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找寻和发现相关的历史学作品，从这些历史学累积下来的相关著述中发现对自己研究有用的历史知识、历史资料和历史认识或结论。

一般性的历史知识或历史常识，可以从很多具体历史研究的作品中得以呈现，甚至相关的历史教科书中呈现的都是这种历史常识，这是最普通的但同时也是最基本的历史知识。当然，作为历史知识不仅仅是常识，具体到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特定方面的历史学研究作品，都会构成研究这个领域、这个方面的历史社会科学知识。从一般意义上说，这些历史知识或历史常识，虽然是历史研究者历史书写和历史叙事的具体内容，但回答的是“历史是什么，历史怎么样，历史为什么”的问题，包括历史中具体的人和事、具体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因果，以及研究者的历史认识、历史理解和解释等。

历史学和历史社会科学的作品在品相上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历史学作品中有大量历史资料的运用，包括档案、报刊、人物的文集、日记、口述史等，或者是历史演进过程中直接留存下来的其他类型的信息。但是，这些历史资料显然都是历史研究者选择过的。选择过的历史资料意味着：一方面，这些由历史研究者从众多的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献中审慎辨识并提取出来的、可能是反映该方面历史事实最为可靠的和最具典型性或代表性的材料；另一方面，正因为它是历史研究者选择过的，也可能存在主观的刻意剪裁和为我所用。不管怎么说，被选择过的史料，只是大量的甚至是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的一粟，社会科学研究者当然可以借助和使用，但也要清楚它可能的局限所在。因为从根本上说，这种借助和转引使用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者接受了历史研究者的资料选择，即认可了他们通过资料的使用所实现的对历史事实的重建。

对历史研究中得出的历史认识和结论，历史社会科学研究者往往会更乐于接受并加以使用。因为对于没有直接做过历史研究的历史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选择相信和尊重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既是他们的学术本能，也是他们的学术理性。他们对历史研究者通过大量历史文献爬梳之后所形成的历史认识一般会认为是可靠和令人信服的。但是，在此需要历史社会科学研究者明了的是，尽管这种历史认识是基于客观的抑或是非常丰富翔实的历史材料得出的，它也毕竟仍属于人的主观认识，受制于历史研究者个体学术功力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是必然的。同时，这种历史认识一般都是直接从历史材料中得出的，为历史材料所囿恐也在所难免。而且，受历史学学科属性和研究目标的制约，一般情况下，这种历史认识往往也欠缺相应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分析。

通过阐释历史作为借助对象的内涵及路径，在明晰借助的“历史”是什么和如何借助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发现借助对象的“历史”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走入历史的意义所在。

（二）“历史”作为借助对象对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意义

作为历史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基本类型，以“历史”为借助对象，对于当下社会科学研究走入历史或者说对于历史社会科学学术实践的具体展开和实际推进有如下意义。

从研究范式转换的基本定位上看，它所显现的是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初步和浅层。对于先天缺失“历史”的历史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走进“历史”首先只能是对“历史”的学习和“借助”，这是绕不开和越不过的第一步。作为研究者，如果没有相应的历史学知识背景及其学术训练，就直接进入漫无边际和杂乱无章的历史材料堆中，不仅是无法做到的，也是一种学术冒险，会因为缺少相应的历史辨识力，而无法驾驭这些资料。显而易见，作为走进历史的第一步，还不能说是已走进了历史的“深处”，尚处于与“历史”结合的浅层或表层状态。因为这个“历史”还属于别人研究出来的“历史”，即历史学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社会科学研究者本身研究出来的“历史”，在此基础上的所谓理论创造也不过是依托别人的“历史”的产物。

从研究作品的属性及品相上看，它使历史社会科学作品的属性及品相初显。从属性上，历史社

会科学的学术作品属于社会科学，而不属于历史学，因为归根到底，它是追求理论产出即一般性抑或规律性，与历史学主要以“事实”而非理论的具体和现象的研究作品属性恰好是相对应的。但是，品相上它又不同于一般社会科学的学术作品，主要就是在理论之外，还有不同程度的“历史”的存在。总体上，历史社会科学的学术作品可以分为两大类四小类。第一大类是历史社会科学规范研究或者纯理论研究的学术作品。它聚焦于历史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属于这一研究范式的奠基和规范性作品。它是“历史”含量最少的一类，其中的“历史”不仅是借助的，而且一般仅作为一个与理论相对应的抽象的对象即作为理论阐释的对象而存在的。这一类以往以历史社会学最为突出，近年来历史政治学也开始出现。^① 第二大类即历史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学术作品。它聚焦于社会科学的特定研究领域和具体问题。依据其“历史”和含量及性质的差异又可分为三小类。一为与其“理论”含量相比，“历史”特别是具体历史过程的“历史”含量较少，并且这些“历史”一般多为概括性历史事实，大都是从历史学学术作品中借助而来的。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和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是这方面的代表作。^② 二为与其“理论”含量相比，“历史”含量较多，并且这些“历史”不仅仅有概括性的历史事实，还有具体微观的历史事实，不仅是借助历史学的，更是自己研究出来的。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作。三为与前两小类相比，“历史”的性质不同，这里的“历史”，不仅是过去的“历史”，也可能是当下的“现实”，不仅是对象，而且更是方法。至此，以“历史”作为借助的对象，在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意义上，至少可以产出和显现历史社会科学前两小类的学术作品（即所谓初显）。

从历史和理论的关系处理上看，呈现出历史和理论的一般和有限结合。以“历史”为借助对象，使社会科学中有了“历史”，但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初始阶段或曰一种研究类型，其根本局限还在于它只实现了历史与理论之间宏观性和一般性的低度结合。因为这种研究，还是在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内对既有的历史研究做了程度不同的借助、依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阐发，历史和理论结合的具体性和深度是不够的。主要处于“以论带史”即以理论统领历史的史论关系状态。这种历史与理论的关系说到底还是别人的“历史”与自己的“理论”的“结合”。这类作品的“原创性或许主要来自于理论而不是详细的历史分析”^③。而且，尽管研究者做了最大的努力，仍有可能犯“事实上和解释中的错误”^④。如迈克尔·曼为了写《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四卷，“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但远未达到全面和彻底的程度”，如果该著的“叙述引用了什么错误的史料，或者借鉴了不可靠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或采纳了一个可能具有高度争议的观点”，他本人认为“这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⑤从根本上说，以“历史”作为借助对象的研究，不是以“历史”为对象的研究，不是研究者对历史的直接研究。借助的意涵仅仅在于依靠“别的人或事物的帮助”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历史社会科学的具体展开和实际推进，需要进入以“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乃至以“历史”为方法的研究阶段和研究类型。

（三）“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含义

“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是指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将特定历史现象作为问题进行直接研究。主要涵盖下列三种情况：一是自主挖掘和运用历史文献尤其是一手历史文献；二是自主重建历史事实；三是形成自主的历史认识并进一步阐发政治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理论。

^① 杨光斌：《历史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范式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② 福山在序言中对此说明：“为了从事如此广泛的研究，我不得不几乎全然依靠二手资料。”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序言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③⑤}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3卷）全球诸帝国与革命，1890—1945》（上），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④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序言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历史研究的前提和第一步就是对历史文献尤其是一手历史文献的自主挖掘和运用。作为历史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进入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情境,首先就不能再只从历史学的研究作品中获取二手文献,而是在此基础上,体现出对历史文献尤其是一手历史文献应有的主体性、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即自主地搜集、获取、处理和使用历史文献尤其是一手历史文献。挖掘和获取是研究者对历史文献尤其是一手历史文献的找寻和发现能力,体现着研究者的历史视野及其研究的基本功,也是其研究水平的基础;辨识和运用是研究者对历史文献尤其是一手文献的驾驭和理解及解释的能力,代表着研究者建构历史知识和形成历史认识的基本功,是其历史研究水平的一个主要标尺。可见,自主挖掘和运用历史文献尤其是一手历史文献,标志着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走进历史的深处。

在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过程中,自主重建历史事实是一个中间环节。它是指历史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通过爬梳大量历史资料尤其是一手历史资料后对历史过程加以具体的事实重建。这是一个小心谨慎乃至艰辛的探索过程。它的全过程都是通过确认真实可信的资料来实现的,它所追求的是客观和真实,还原历史本真,展现历史逻辑。它体现着研究者对历史过程的理解能力和研究水平,代表着研究者建构历史知识和形成历史认识的基本能力。走进历史的深处,最主要就是对历史过程的研究,即对历史事实的重建,对历史因果的本真呈现,对历史复杂性的彰显和揭示。历史事实的重建非常不易,但又极其重要。如果研究者对人类社会重要的历史过程、重大的政治变迁都不能够自主性地把握和重建,那又怎么样去理解、抽象和概括那些政治普遍性呢?因此,自主重建历史事实是形成历史认知和阐发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前提,是社会科学走进历史深处的基本标志。

形成自主的历史认识就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重建来进行自主的历史认识,它是历史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在还原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它体现着研究者对历史的解释能力和认知水平。但是,一方面,这种历史认识和社会科学理论又不能够简单地加以等同,它不一定具有明确的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属性。正如法国政治学家阿隆所指出的:“历史认识不是简单的事件积累。在活人的精心阐述下,历史旨在重建逝者的存在……它有别于自然科学,甚至有别于旨在解释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事的社会科学。”^①另一方面,它却是历史事实和社会科学理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进一步阐发社会科学理论的知识前提。因此,它在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是走进历史深处的结果。

(四)“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对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意义

比起以“历史”为借助对象,以“历史”为研究对象是更进一步也更深入的历史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类型,对于当下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即历史社会科学学术实践的具体展开和实际推进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从研究范式转换的基本定位上看,它所显现的是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深入和深层。它实现了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标志着这种研究转向进入一个更为深入和高级的阶段,使其不再满足于对历史的知识、材料和认识的借助,而是在历史文献尤其是一手历史文献挖掘和运用、历史事实重建、历史认识形成等研究环节上都凸显了研究者对历史的自主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做了历史学者没有做的最后一步,即从历史研究中发现和创新社会科学理论。可谓既走进历史深处,又从历史深处中走出来。

从研究作品的属性及品相上看,它使历史社会科学作品的属性及品相呈现跨学科的特征。从属性上来讲,比起以“历史”为借助对象的历史社会科学作品,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社会科学作品的历史学属性更突出了,尽管仍可视作社会科学作品,但同时也可看作是历史学作品。品相

^① 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46-4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上，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社会科学作品同样也兼具明显的历史学作品的品相，内外均显现了更多和更高质量的“历史”：丰富的历史文献尤其是一手历史文献、微观精细的历史过程、准确深入的历史认识等，前举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是这种跨学科研究的一部代表性作品。对此，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摩根索曾评价该书“既是一部体裁宏伟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政治科学著作”^①。

从历史和理论的关系处理上看，则实现了历史与理论的高度或深度的结合。由于对“历史”不再仅限于“借助”层面，而是作为“研究”的对象进行自主性探究，也就不再拘泥于社会科学既有的理论框架，而是依据历史研究建构新的理论框架和阐发新理论，进而实现了“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并赋予其新的意涵。“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是历史学一条基本的研究规范和学术共识。在历史学中，“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的“论”，主要是指基于历史事实重建所形成的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论，而在历史社会科学中，这个“论”不仅是历史认识，也是社会科学的“理论”。“论从史出”可以理解为理论来自历史，“史论结合”也可以理解为历史和理论的结合。显然，这种历史和理论的结合是走进历史深处的深度结合，由此形成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主体的学科属性也就都具有了跨学科的意义。美国政治学家罗斯金就此谈到：“对政治学者来说，历史是主要的资料来源之一……但历史学者与政治学者找寻不同的答案，且用不同方法处理资料”，历史学者“很少提供或是根本没有通则化”，“政治学者则以找寻一个通则化为开始，我们经常拿历史学者的发现来比较及对照……有些历史学者也有可能做比较研究，我们就把他们升格为政治学者”。^②

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社会科学的研究虽然已表明社会科学走进历史的深处，但是，从研究主体本身的转变而言，这并不是其所谓“历史转向”的终点，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只是历史，还有现实。这种“转向”如果仅仅将“历史”归结为研究对象，那么，由此所建构的研究进路和研究范式是无法完全确立下来并得以延续的。社会科学运用什么工具和方法去做历史研究，才是这种转向的最后一站和最高层次，这种工具和方法就是古老而又现代的历史思维和历史方法。

三、方法“历史”的两重内涵及其对“历史转向”的意义

所谓方法“历史”的两重内涵，是指社会科学学术实践中以历史作为操作方法和思维方法的两种情况，是具体展开和实际推进历史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的两种形式。它是对“以历史为对象”的超越，凸显了其对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方法论意义。

（一）“历史”作为操作方法的含义

在今天，谈到历史方法，或许有些学人会不以为然，因为“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这句名言似乎让人感到历史研究可以无师自通。但实际这是一种错觉，因为“选择事实材料的过程本身就要求”“有纯专业的训练”。^③当代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谈及这方面情况时说：“虽然现在已经有一些社会科学家投入我们历史学的阵容，并且获得了我们的尊敬，但另外却有更多的社会科学家用相当粗糙而机械的概念与模式来研究历史……有不少人冒险进入历史领域，面对着浩瀚的原始资料却浑然不知其中的危险，也不知道该如何避免或克服这些困难”。^④霍布斯鲍姆讲的这个情况也许契合了我们当下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某些实际。

而所谓“历史”作为操作方法，就是指历史社会科学学术实践中历史研究外在的实践方法，即

^① 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序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② 罗斯金等：《政治学的世界》，3-4页，时英出版社，2002。

^③ 茹科夫：《历史方法论大纲》，198-19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④ 霍布斯鲍姆：《论历史》，120页，中信出版社，2015。

对历史资料（也包括现实资料）的搜集、整理、鉴别和运用等手段、方式和程序，主要包括搜集和获取史料、整理和鉴别史料、运用史料等方法和环节。

以特定问题为对象的历史社会科学研究，搜集和获取史料（包括现实的材料）是展开具体研究的基本前提和第一步，这一步“最劳而最难”^①。尽最大努力和一切可能去发现和挖掘史料，是一种应有的研究意识和学术自觉，应以“穷尽一切”为精神，以史料的丰富、多样作为追求的目标，避免单一化。人类历史愈趋晚近，史料的类别越多，但是其中一手史料最被看重，因为它是历史演进过程中直接留存下来的文字记录及其他信息，包括各类档案、日记、报刊等，而其他史料如回忆录（口述史）等则应为辅助。这方面，或是基于不同的问题诸如包括题域大小和具体历史时段等的差异，或是由于研究者相关经验和客观条件的不同，对史料的搜集和挖掘会有诸多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对获取的丰富多样的史料，整理和鉴别是重要的一环，也是运用的前提。历史的复杂性在史料方面的一种体现，就是其真伪问题的存在。无论是直接留存下来的还是当事人后来追述的，都可能存在不真实的情况。如果不加全面系统的整理和鉴别，研究者或许就会被历史的假象所遮蔽，而难以发现历史的真实。“正误辨伪，是谓鉴别。”^② 审慎比较，小心求证，反复考订，去伪存真，是一项艰巨的研究任务，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傅斯年指出：“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而整理史料的唯一方法，他认为就是“比较不同的史料”。^③ 这种比较，“就是竭尽一切努力来确定一项史料、信息，以至事实的可靠程度”^④。只有如此，才能对史料加以运用。

史料运用，就是进行历史书写，通过史料再现历史。历史书写是史料运用的过程也是结果，运用的充分性是基本要求。“没有充分的材料，便不能说明历史的活的具体的内容。”^⑤ 这一点不仅仅只是历史学科的自身规范，对于社会科学也是如此。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指出：“每一门社会科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每一种思虑周详的社会研究，都要求其观念具备历史视野，并能充分运用史料。”^⑥ 运用的综合性是另一个基本要求。能否综合性全面性地运用史料，是研究者学术素养和治学态度的体现，也直接涉及和影响研究质量和成果水平。“历史研究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使用的史料不限于某一种（如考古发掘的结果，文献的利用等等），而是使用了提供相互补充的信息的各种史料的总和。”^⑦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就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和政治材料写成的。”^⑧ 相反，偏重于某一种或某一类史料的使用一般就被视为研究的大忌。因为运用史料就是展现和还原历史，体现着历史事实的呈现是否具有完整性、真实性和可靠性，代表着研究者对历史事实的把握度，随意举例和使用史料对研究是有害的，也是不严谨的表现。如列宁所批评的：“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⑨

①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41、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③ 傅斯年：《史学方法论导论》，3页，中华书局，2015。

④ 茹科夫：《历史方法论大纲》，20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⑤ 《吕振羽全集》第2卷，290页，人民出版社，2014。

⑥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20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⑦ 茹科夫：《历史方法论大纲》，20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⑧ 《列宁选集》第4卷，27页，人民出版社，2012。

⑨ 《列宁全集》第28卷，364页，人民出版社，2017。

当然，在大量杂乱的史料中，如何运用得恰到好处，既能展现历史事实的完整性、准确性，又能体现史料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同样是基本的要求，也是研究者的历史感、判断力和研究功力的主要标志，这方面需要不断的研究实践去培养和积累。

（二）“历史”作为操作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意义

作为操作方法的历史方法是以如何处理与使用历史文献和资料为核心的综合性技术方法，也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最一般最基础的入手之法之一。它对于当下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即历史社会科学学术实践的实际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从研究范式转换的基本定位上看，社会科学研究者掌握和运用历史操作方法，无疑标志着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开始进入最高层次和最后阶段。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具体学术转向中，方法的转向是其最根本的转向。在今天，走进历史，掌握和运用历史方法，表明这一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基础性地位的恢复乃至重新确立。历史地看，历史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地位一开始就存在着。早在19世纪末，意大利政治学家莫斯卡提出：“无论政治科学在未来有怎样的实际价值，这一领域要取得进展，必须立足于研究社会事实，而这些事实只有在各国的历史中去找。也就是说，如果要使政治科学立足于对政治生活的事实观察和诠释，那么我们就必须诉诸于传统的历史方法。”^① 法国学者塞纽博在20世纪初指出：“历史在社会科学中据有了一个固定不变的地位。历史只能够显明地凭著历史方法来研究。”^② 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也在20世纪30年代初一语中的：“政治之学，非深明历史不可。”^③ “深明”不仅仅是“精深”的含义，更代表着政治学研究者对历史的研究，即掌握历史方法。因此，今天复兴这一传统方法，方能真正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转向”。

从研究作品的属性及品相上看，掌握了历史操作方法，知晓如何发现和获取、如何比较和鉴别、如何运用具体材料，不仅可以产出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社会科学作品，也可以产出以现实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社会科学作品，这是作为研究范式的历史社会科学得以确立的最终标志。因为历史是连续的，历史和现实只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一种以自身存在的时间为基准的二分。对研究者而言，历史和现实虽可视为两种不同类型或不同层次的研究对象，但它们本质上是一致的。现实是现在的历史，历史是过去的现实；而且，它们得以存在和变化的条件、环境本质上也是一致的。研究历史就是研究过去的现实，研究现实就是研究当下的历史。历史方法可以应用于以历史为对象的研究，当然也就可以应用于以现实为对象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社会科学根本上是以“历史”为方法的社会科学。诚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虽具有某种统一性，但方法只是对象的“类似物”，而不是对象本身。对象和方法不能等同和混淆，可以用方法来研究对象，但不能把对象等同于方法。在此，对象的“历史”是指研究的领域和问题，方法的“历史”是指研究的手段和工具。对研究主体而言，对象和方法毕竟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对象是客体，方法则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手段和方式，具有灵活性，可以根据主体的需要作用于不同的客体即研究对象。

从研究主体的学术自主性上看，研究者一旦掌握了历史方法，就可以摆脱只能把“历史”作为借助对象的窘境，具有更多的研究自主性和更广阔的自主研究空间，不仅可以自主地展开本学科历史问题的研究，也可以运用历史方法研究本学科的现实问题，并可以弥补现实问题研究中直接观察法或思辨法的局限和不足。塞纽博曾指出：“这个观察法在一种社会研究上差不多时常要感到不足

^① 莫斯卡：《政治科学要义》，1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② 塞纽博：《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15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

^③ 章念驰编：《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4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以综合这些重要事实的总量。所以我们应当向资料求援，为现代事实的知识也是如此的，而且这件资料惟要用历史方法才能够加以研究的。”^① 也就是说，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仅靠直接观察和演绎推理是不够的，需要通过历史方法获取直接观察不到的事物或问题背后的“资料”，以此弄清事实，才能得出科学结论。

总之，作为操作方法的历史方法，通过处理历史材料和历史书写，来努力展现历史（包括现实）的特殊性和普遍性、阶段性和连续性、偶然性和必然性、多样性和统一性、复杂性和规律性，呈现千变万化、色彩斑斓但又万变不离其宗、千色浮之于底色的历史面相。但严格意义上说，操作方法作为技术方法，只是一套操作的规程，不是内在思考的认识方法，至多是认识方法的外化，它本身是无法独立达到上述历史研究成效的，而主要通过认识方法的内在支撑方可实现。历史方法是外在方法和内在方法的统一，是操作方法和思考方法的统一，支配和规范人们思考的内在的历史方法就是历史思维。

（三）“历史”作为思维方法的含义

所谓历史思维，是指人类以“历史”为特定对象的认识能力、认识过程及其呈现出的逻辑技术和思维织体。逻辑技术是指思考和认识历史的理路和规则，思维织体则是指思考和认识历史的结构和图景。在此，需略作说明的是，“历史思维”与“历史观”“历史哲学”“历史方法”等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隔，使用这一概念不仅在于它表述历史认识方法的准确性，而且还在于它比上述概念更具有学术张力。它连接和关涉上述概念，既可以统合上述概念，又可以超越上述概念。作为人类的历史思考方式，它通过历史观的建构得以具体展现；历史哲学则是对历史思维的研究和反思，通过历史哲学，历史思维得到某种概念化和理论化。而历史思维和历史方法在含义上既相互包含，又相互区别，在特定的语境中，两者也可以相互替代使用。从研究实践上看，从操作方法到思维方法显现了从“方法学”到“方法论”的意义变化。在研究实践中，“方法论要求对资料进行理论思考”，方法学则“指的是研究者所利用的方法和技术手段的全部总和”。^② 广义的“历史方法”就包括了“方法学”意义的操作方法和“方法论”意义的认识方法——历史思维。作为人类思维的一种基本形式，它有着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体现在人类历史思考的基础、原则、对历史变动及其因果的基本认知等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其三大认识论特性。

其一，客观认识论。首先，是对历史思维对象——“历史”的客观性的强调。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一个客观的与自然过程一样的人类社会的自我过程，而不是可以为人们所任意装扮的物件。也就是说，尽管历史是人类的活动，但它同样“具有客观性，不依赖人的主观愿望和目的而独立存在”^③。这种历史的客观性，彰显着客体存在于主体之外的客观事实，构成了对人的历史认识的首要前提和根本制约。历史客观性本质上是强调历史事实先于并独立于历史认识，历史认识来自于历史事实。“历史事实不仅高于历史解释，而且独立于历史解释：要判断某个历史解释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它在多大的程度上说明了事实……客观性的观念坚持真理只有一个，而且不受观察角度的支配。”^④ 其次，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历史是客观的，它要求研究问题就是要从客观事实出发，而不是相反——从原则和主义出发。恩格斯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⑤。他并且强调：“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⑥。主张“一切历史都

① 塞纽博：《社会学与历史方法》，15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

② 茹科夫：《历史方法论大纲》，3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③ 科瓦利琴科：《历史研究方法》，7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④ 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导论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10、878页，人民出版社，2012。

是思想史”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也认为，“对于历史来说，真实就是成为一个事实，即在过去性（pastness）中寻求客观性”^①。长久以来，这种客观性原则已成为历史学最基本的学术传统。当代德国历史学家吕森指出：“历史学研究的传统，其自尊就在于，它声称与非专业历史学相比有着更高层次的有效性。一般用的词就是‘客观性’。”^②“追求‘客观性’”乃至“成为认识和伦理上的典范。”^③但是，如果为某种特定的主观目的或为现实需要而解释历史，即所谓历史的“辉格解释”，也就背离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进而尝试找寻“穿越历史复杂性的捷径”^④是徒劳无功的。这样会陷入对历史的人为裁剪，任意裁剪历史是不可能得出科学认识的。当然，现实中或许“人们无法完全回避‘现在主义’，即回避现在在解读过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扭曲作用，但为了客观性，人们只能设法去限制其中有害的后果”^⑤。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客观性原则就是尊重历史。再次，历史的客观性也不是绝对的，恒定的，而是相对和不断变化的。“不只是历史学家的看法在变，就连历史事实也在变。历史事实的意义和我们对它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取决于它的不断变化着的后果。在这种意义上，历史事实就没有自然事实那种意义上的给定的客观性。”^⑥这一点也是理解历史的客观性不能忽视的。因此，客观认识论作为历史思维的首要原则，须为研究者所恪守。

其二，具体认识论。首先，是对“历史”的具体性的强调。历史思维一般认为，任何历史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都是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发生和变化的。没有永恒的历史，更没有超越时空的历史。正如恩格斯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⑦。其次，是历史认识的具体性。它要求研究者一定要将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时空和场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泛泛而论。列宁把“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⑧，他对此反复阐明和论述，其中经典性的表述有：“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⑨；“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⑩等。在当代，有历史学家认为：“历史方法的应用就是要对具体情势进行具体分析”^⑪。作为政治学家的沃格林也认为，由于“人类存在所具有的历史性”，使得政治科学“理论化的工作必须从一个时代具体的、历史性的处境出发”。^⑫可见，具体认识论作为历史思维的一个主要原则，是展开历史研究的一条基本规范，对今天历史社会科学研究也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其三，有限认识论。首先，是对历史认识主体有限性的强调。历史思维一般认为，人既是历史认识的主体，也是其客体。作为主体，人本身具有特定性或历史的有限性。任何人都是特定的历史时代、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中的人，必然要受到来自那个历史时代、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这样那样的限制。对此，英国历史哲学家卡尔说到：“历史时代中的历史学家，同时也受该时代人类状况的约束。”“我们只有以当下的眼光看待过去，才能理解过去。”^⑬对今天而言，有限性要求人们站在

① 柯林伍德：《史学原理》，1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② 吕森：《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 序一》，载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总序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③ 洛伦茨：《跨界：历史与哲学之间》，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④ 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16页，商务印书馆，2012。

⑤ 勒高夫：《历史与记忆》，12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⑥ 何兆武：《从思辨到分析：历史理性的重建》，3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49页，人民出版社，2012。

⑧ 《列宁选集》第4卷，213页，人民出版社，2012。

⑨ 《列宁全集》第26卷，140-141页，人民出版社，2017。

⑩ 《列宁选集》第2卷，375页，人民出版社，2012。

⑪ 茹科夫：《历史方法论大纲》，2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⑫ 沃格林：《政治的新科学导论》，27页，上海三联书店，2019。

⑬ 卡尔：《历史是什么》，109页，商务印书馆，2007。

今天的历史高度，运用今天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准去分析和阐释历史。我国历史哲学家何兆武指出：“今天的历史学家，其地位与条件已不同于过去，他们是从今天的思想高度来看过去的……我们理解过去，不能超出今天的条件。”^① 也就是说，看待历史，既不能脱离时代，也不能不顾及条件和环境，只能也必然是将“历史”置于时代、条件和环境之中“有限”地看。其次，是历史认识的有限性也即历史认识的历史性。人的历史认识，都受到特定的时代条件和具体历史环境的限制，都是特定的历史产物，每个时代的历史认识都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即历史认识的历史性。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② 对历史的任何认识本身都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都是历史性的，即历史认识的有限性。这同样是历史思维的一个重要原则，为历史社会科学研究者所明晰。

（四）“历史”作为思维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意义

历史思维的认识论特性也彰显了其方法论特色，集中展现了其对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即历史社会科学研究展开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历史思维作为人类三大认识方法之一，与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同居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第一层次，是当下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尤其是历史社会科学研究推展亟需而坚实的基本方法。人文社会科学第一层次的三大方法——科学方法、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人类最基本的三大思维形式——科学思维、哲学思维和历史思维，也是社会科学的三大传统——科学传统、哲学传统和史学传统。它们共同支撑着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厦。但在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总体很强势，而历史思维则非常弱化甚至缺失，造成社会科学本身所具有的一个基本的内在性即历史性不彰。在研究实践上，社会科学研究者不掌握历史方法，直接运用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理论方法、分析框架等等，实践上做不好也做不到，往往只能把那些理论和框架“拿来”，嵌套和框定研究对象，然后得出所谓结论，但其实结论原来就在理论和框架之中。从根本上说，这是由第一层次方法和第二层次方法的关系所决定的。第一层次方法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直接产生出来的最基础性的思维方式，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工具即认识方法。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则是在它们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不是认识方法，而只能称之为理论方法。二者不是一个方法论层次。第一层次方法可以独立存在和运用；第二层次方法即社会科学各学科理论方法科学和有效的运用，则必须依赖于第一层次方法，以其为基础。因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历史思维首先就是基本的认识方法。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首先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③ 当下推进历史社会科学研究，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从方法论上亟须复兴历史思维和方法，重新确立其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方法论的基础地位。我国历史学家杜维运曾强调：“如果认为科学方法是人人可得而取用的方法，史学方法更是天下所有学者的利器，而不为史学家所私有。‘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在所有方法中，史学方法应有类似的地位。”^④

第二，历史思维为当下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即历史社会科学的具体研究提供了先求实后求是的逻辑秩序和认知范式。社会科学的一个普遍特性就是其理论性，研究过程从概念出发，从理论到理论，是常见的现象，这也是造成有些研究空泛、言之无物的症结所在。走进“历史”尤其

① 何兆武：《从思辨到分析：历史理性的重建》，1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873-874页，人民出版社，2012。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15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④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是以“历史”为方法，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历史社会学在欧美的发展已有前例，历史政治学在当下中国的兴起，实现对对象到方法的转向，可以更好地解决政治学研究的这类问题，尤其是历史思维先求实后求是的逻辑秩序和认知范式会为社会科学研究起到很好的示范和规范的作用。恩格斯指出：“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①。历史思维告诉我们，学术研究要先搞清事实，还原历史，奠定事实基础，再阐发理论；不是用理论来框定历史事实，而是从历史事实中来发展理论，这是一条不可移易的认知秩序。而且，历史思维的这种逻辑秩序本质上与科学逻辑是一致的。柯林武德指出：“一切科学都基于事实。自然科学是基于由观察与试验所肯定的自然事实；心灵科学则是基于由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②法国思想家迈斯特则强调：“历史是实验性的政治；在自然科学领域，只需要一次实验，即可让一百本深奥的理论著作消失得无影无踪。同样，在政治科学领域，如果不是从经过验证的事实中大体上有可能推导出来，任何理论都是不可接受的。”^③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理性来自自然事实，历史理性来自历史事实，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历史理性“比物理理性更理性，更严谨，更严格”，“它使每一个事实都在其产生的过程中流动，它看到了事实是如何发生的。它不认为它通过将人类现象简化为本能和‘官能’的宝库来揭示人类现象”^④。某种意义上这也体现了历史（社会科学）理论比自然（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独特价值。

第三，历史思维为当下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即历史社会科学学术实践贡献了以理解为核心、充满活力的综合性思维方法。如果说，先求实后求是研究必须遵循的逻辑秩序和程序规范，那么，以理解为核心、充满活力的综合性思维方法则体现的是历史思维的逻辑结构或要素关系。历史学是研究人类自身在时间中的活动，主客体是同一范畴，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后人认识前人，认识前人的所思所为；前人影响后人，影响后人的所思所为。如此，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即对自身的认识，不可能像对自然物一样从外部加以认识，而是从内部去理解。作为一种认识方法的理解，“是历史学和一般人文学科的方法论中的一个核心要素”^⑤。从内涵上说，理解是主体对客体本身的一种了解和领会，即“试图从历史现象所独有的特殊性或个性出发来把握它，而不是从历史进程的一般呈现中推导它”^⑥。19世纪德国历史哲学家德罗伊森指出：“历史方法的特色是以研究的方式进行理解的工作”，“理解之所以可能，因为历史材料里面所表现出的前人言行，与我们今日的言行性质上是根本相类似的。”^⑦另一位德国历史哲学家狄尔泰也有基本一致的看法，认为一个个体“之所以理解历史，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⑧，他与历史中的人“具有某种共同的东西”^⑨。理解体现着人对历史的思想能力，正如洛克所言：“所谓思想底能力就是叫做理解”^⑩。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4页，人民出版社，2012。

② R. G. Collingwood. *The New Leviathan or Man, Society,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Oxford: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47, p. 280.

③ 迈斯特：《信仰与传统——迈斯特文集》，156页，商务印书馆，2010。

④ Jose Ortega Y Gasset. *History as a System and Other Essay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61, p. 232.

⑤ 奥拉夫森：《行为辩证法——历史学及人文科学的哲学解释》，228页，大象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09。

⑥ 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词典》，27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⑦ 德洛伊森：《历史知识理论》，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⑧⑨ 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78、73页，译林出版社，2011。

⑩ 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93页，商务印书馆，1959。

解构成了历史思维的核心要素。与理解紧密相连的另一种思维要素是解释。解释是在理解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意会,是以理解为基础的一种对客体的附会和引深,更多地体现出认知理性。“解释是以理解为前提,并建基于理解之上。”^①一方面,解释依赖于理解,是在理解基础上的认识深化;另一方面,解释也包含着理解,更会“深化”或“改变”理解。“解释所具有的‘深化’和‘改造’这两种功能是彼此完全相异的”^②。理解和解释构成了历史思维的基本结构。历史思维根本就在于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各种纷繁复杂的事物和现象及其关系在时间上的变化,既是对变化和积累的认识和把握,又是普遍性兼顾下的特殊性追求;既是显微镜,也是望远镜。而且,历史绵延不断,充满着矛盾和辩证法,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也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不断注入新的活水和活力。活力即创造力,通过不断的理解和解释即可实现源源不断的认知创造力,也显现了与自然科学认知的不同。德罗伊森认为:“理解(Verständnis)的行为和逻辑机械式的认知行为是不一样的”,“正好像一个心灵潜入到另外一个心灵一样……具有无限创造力。”^③而所谓综合性,不仅体现在理解和解释的基本结构以及两个不同的认识层次,而且蕴含着多种思维类型,“理解的行为既是综合,又是分析;既是归纳,又是演绎”^④,凸显其综合性特征。

需强调的是,历史研究中的历史理解和解释,虽有抽象和概括、归纳和总结,但这仍属于历史学范畴的历史认识。社会科学走进历史不是终极目的,而是从历史中走出来,走向理论创造。由此,理解和解释的认知过程还需要与社会学学科中具体的理论相联系、相连接,进而发展理论,创新理论,只有做到这一步,历史思维的方法论价值才得以真正彰显,这种研究范式才可称得上是历史理解和解释的历史社会科学。

四、从对象的“历史”到方法的“历史”: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必由之路

从以历史为对象到以历史为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即历史社会科学研究具体展开的实践之路,也是必由之路。进而言之,它是历史和理论结合、时间和结构互嵌之路,也是构建科学性和历史性相统一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道路。社会科学本质上和历史学一样,都是人自我认识的系统知识,其科学性内在地包含着历史性;反过来,历史性也是社会科学科学性的应有之义和根本支撑。没有历史知识和历史方法的社会科学是欠缺根基的,也是不完整的。“人在政治社会中的存在是历史性的存在;并且如果一种政治理论试图深入到原则层面,它就必须同时是一种历史理论。”^⑤相应地,“如果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它将是一门历史科学”^⑥。所以,社会科学如果仅注重“科学”和结构,忽视历史和时间,会使其学科自主性和能动性发生问题。拒斥和否定历史性的科学性抑或是一种绝对主义,其科学性也就成了问题。熊彼特曾总结说:“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⑦英国历史学家伯克认为:“没有历史学和理论的结合,我们既不能理解过去,也不能理解现在。”^⑧现代社会学发展的大历史昭示,历史和理论结合一直是人们努力的方向。早在20世纪40年代,沃格林就认为,历史和理论“至少就政治‘理论’一科而言,这二者不可割裂开来”^⑨。当代德国政治哲学家赫斯勒也认为:“历史学思维和社会学思维的一个富有成果的结合在今天仍然是可能的。”^⑩实践中,不仅宏观层面可以实现结合,微

① 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9页,东方出版社,2001。

② 赫施:《解释的有效性》,15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③④ 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⑤ 沃格林:《政治的新科学导论》,25页,上海三联书店,2019。

⑥ 芒克、斯奈德编著:《激情、技艺与方法:比较政治学访谈录》,373页,当代世界出版社,2022。

⑦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32页,商务印书馆,2009。

⑧ 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⑨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一):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2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⑩ 维托里奥·赫斯勒:《道德与政治: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伦理基础(第1卷)规范性的基础》,284页,商务印书馆,2021。

观和具体层面也能够实现结合。“社会科学的理论，只要它涉及特定的应用领域，就能同历史的阐述相适应。”^① 历史社会科学研究就是实现历史中有理论，理论中有历史，时间中有结构，结构中有时间。一方面，将概念历史化、具体化、时间化；另一方面，将历史概念化、理论化、结构化。前者是将概念和理论所反映的具体内容在历史中再现；后者则是将历史和时间中那些具体复杂的变化及其因果抽象浓缩为概念和结构，简化为人们可理解的“理论”。

归根结底，研究范式是由研究方法所决定的。“历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最根本的意蕴是其方法论地位，历史思维是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根本指南。当然，历史思维并不排斥科学方法和哲学方法，它已经融入了科学方法和哲学方法。因此，思维方法的“历史转向”才能真正建构起科学性和历史性相统一的社会科学，真正服务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华现代文明创造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From the “History” of Object to the “History” of Method: Practical Thinking of “Historical Turn”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WANG Xuti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As a development trend, “historical turn” actually means that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s stepping into the history again, which has both realistic needs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To consider “history” as a method instead of an object is the path we must take. To consider history as an object, that is, the “history” of so-called “object”, has connotations of “helping” and “researching”. It shows the significance in different degrees, different levels and different results in the “historical turn”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o consider history as a method, that is, the “history” of so-called “method”, has connotations of both operation technique and thinking method. It shows the significance in methodological of the unification of operation technique and thinking method in the “historical turn”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History is the first level approach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it is a basic form and main path of self-reflection and self-cognition. As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existence in all fields of human society,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social science must be considered, understood and explained historically. By using history as a method can it truly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y and the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 science that combines science with history well.

Key words: Social science; Object; Method; Historical turn; Historical politics

^①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20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